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世俗精神观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张立新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世俗精神观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张立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卢 典

封面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俗精神观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张立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143-3

I. ①世… II. ①张…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522 号

世俗精神观照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SHISU JINGSHEN GUANZHAO XIA DE RICHANG SHENGHUO SHIXUE

张立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05 千字

ISBN 978-7-01-016143-3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自序：被“压抑”的现代性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当代文学就有重返“日常生活”现场、从“神圣”到“世俗”、从“宏大”到“琐碎”的转向，尤其是随着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发展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反映在文学上，日益从表现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层面转向世俗生存层面，“日常生活”这一荒地大面积勘探开采，文学全面走向了世俗化。

文学对世俗性和日常性的全面接受，成为当代文学的最大特点。世俗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概念，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海德格尔以为，人在本质上都是诗人，人类的存在归根结底乃是一种艺术的存在。但人的肉身存在决定了生命的“此在”性、生活的世俗性，离开世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谈论生命价值是无意义的。世俗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力量。相反，它之所以强大，就在于世俗是无数的生命个体纠结而成的整个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果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生命实体，那么，世俗就是它的血肉。作为一种最贴近生命本身的文化，世俗关系到的是民生，是最广大的日常生活状况，任何革命和变革，任何来自上层建筑的东西，最终都要作用于世俗这个层面。世俗文化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它不高远，但却是体贴入微的。中国的文化哲学也是生命哲学，多感性，少理性。“中国文化及其审美的情理结构是以此世人生为根基、为极限”，“生活意义就在生活之中，就在自觉地享用这状似琐碎平凡却正是人生实在之中”。^①然而，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最广博丰富的现实生活世界、最能体现出文化品性的世俗文化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开掘。在通常的认知中，知识似乎天然地构成了文化这一概念的主旨，对文化的这一误读，就把无限生动丰富、最富有生长性的文化内涵狭隘化、书本

①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5—126页。

化、凝固化了。事实上，文化对日常生活世界有极强的依附性和渗透力，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双向合成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既定的外在于生活世界的观念性想象，只有在个人生存的意义被感知，文化才能获取自身的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历史文化散文，发展到后来就有些凌空蹈虚了，面对书本和历史高谈阔论，却在活生生的现实人生面前失语。西部散文作家刘亮程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本身对他的教育”，然而，“除了书本，我们已越来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万物学习，接近生存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人类的书籍泛滥到比自然界的树叶还要多了，真实的生存大地被书页层层掩藏。一代人从另一代人的书本文化上认识和感知生存，活生生的真实生活被淹没了。思想变成一场又一场形成于高空而没落到地上的大风，只掀动云层，却吹不走大地上的一粒尘埃。能够翻透书本最终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一生活在一本或一大摞书本之上，就像养在瓷瓶中的花木，永远都不知道根在广阔深厚的土地中自由伸展的那种舒坦劲”。^①作家李锐评价刘亮程的文字“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在刘亮程笔下，村庄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命本身的高贵，哪怕是一株草、一股炊烟，这种对最平凡事物的“高贵”体验，正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世俗精神。

所谓的世俗精神，是基于生命哲学的一种入世精神。文学是一种很“贵族”的精神活动，但表现内容往往是凡俗的。能够感受到文学的贵族精神相对容易，而要发自内心地体会到文学“贵族”身份背后的那份世俗情怀，却需要大量人生体验和感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世俗性与现代性、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在前现代社会，世俗精神还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济文化的发展、日常生活世界的丰富，现代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促成了世俗精神的觉醒。世俗性也是孕育现代性的重要温床。“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

① 刘亮程：《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417页。

拥有、所知道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①按照这个解释，可以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个体求新求变的心理焦虑及行为，强调的是主体性和个人性。文学的个人性，也可以说是文学的现代性。从这种角度看，围绕生存实践的日常生活是个体的、感性的，历史理性的各个环节都会被具体而微的生活过程改写。因此，日常生活暗含着一种对历史理性的对抗性，日常生活中生命的种种存在，真实地反映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本质状态。

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的序言里说：“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②真正的艺术来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源于世俗社会。但世俗不是媚俗，一味地媚俗“大众”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大众”的不尊重，并不能真正地赢得大众。张爱玲在《论写作》中谈及作者和读者关系时说过一段颇为在理的话：“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现代艺术趋向于对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列斐伏尔以为，在现今时代，艺术与哲学越来越趋近于日常生活。文学是入学，对人的世俗存在和最大面积的日常生活的发现是文学的本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的发现。在传统文学艺术形式中，承载世俗的小说曾被认为是艺术中最低级的门类。但阿城认为，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小说是随着世俗一路下来的。中国几大古典文学名著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的世俗性、它的人间情怀。如《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恰恰是他身上所具有的普通人的凡俗性，使他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经典文学形象，与之相对的四大皆空的圣人唐僧，形象就干瘪多了，就如同一个空洞的道德符号。自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后，小说被赋予了改良社会的重任，小说变成“大说”，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感召下，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就一直肩负着救亡图存、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文学的个体生命意识的生长处于被压制的状

①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总序第 3 页。

②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 页。

态。五四虽提倡个性解放，但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危机和救国救民的重负下，文学叙事中的家国情结浓厚，个人主义、个体价值处于被压制状态。张新颖在“精读”沈从文的过程中质疑五四新文学所发现的个人，认为五四以来的很多作家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假”的，是现代理论催生出来的自我，是没有个人真实“来历”的。五四的自我观念是西方输入的一些观念话语制造出来的，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把制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发现的东西。张扬人的文学的五四，其落脚点并不在人，而是在人背后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传统、观念、历史等组织结构性的东西。而在沈从文那里，人是天地万物百汇中的人，自我是天地万物百汇中熏陶出来的实实在在的自我。这样，与五四新文学所发现的个人和自我相对照，沈从文的异质性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①。沈从文立足于民间文化立场，对接近自然状态下的乡土日常生活空间的书写，也是对现代性话语霸权下的乡土叙事的反拨。

陈晓明以为：“中国的现代性在市民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及内在情感方面需要重新建构，更彻底地说，就是需要补上‘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课，将其重新释放出来。”^②在革命风起云涌的现代文学主流中，也一直存在着回归世俗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潜流。自觉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张爱玲凭女性的艺术直觉敏感捕捉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她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③。张爱玲的日常生活诗学可以说是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这也是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之所在。可见，日常生活叙事不是一种风格，而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杨义认为，现代文学有参与历史的传统。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太多，现代文学总是承载了太多自身以外的“历史”重任，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企图给出答案。直到新时期伊始，政治生活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文学延续着家国大叙事，个人性话语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而起的个体阶层的日益壮大，过去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价值观念被强力改写，新的世俗人文主义倾向逐渐确

① 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 陈晓明：《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③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立。社会生活的日益世俗化决定了文学的世俗化转换，新时期初期那种历史焦虑已然淡化，“新写实”的出现正是这种转化的反应。代表作品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单位》等，将文学从形而上的思考拉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中，聚焦普通人的庸常人生，由日常生活出发直面生存本相，力图呈现“生活的原生形态”。文学从来没有如此紧贴生存现实，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发现人性人情，个人才真正成了生活的主角。在日常生活的无意义叙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放到了醒目的位置得以考量。日常生活也得以从幕后走上前台，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和诗学内涵。

北岛有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当历史硝烟散尽、共同的社会理想黯淡，意义增殖的文学简化到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存在后，日常生活无疑成了重要的表现空间。由“新写实”的存在之无奈，到后现代日常生活叙事的存在之狂欢，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作家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从最初的失落到积极发现，其世俗本质观逐步确立，世俗精神日趋成熟。

在世俗精神观照下，日常生活诗学是一种平视的诗学，以平民的视角和情怀去审视人生。这种平民情怀需要一种目光下沉。王彬彬在《才华与情怀》中说：“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学上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情怀。读当代中国许多作家的作品，只让人感到他们灵魂的庸常、肤浅和鄙俗，虽然可以感到他们十分注重技巧，极力在那里精雕细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们的那种如海般辽阔深邃的情怀，是什么时候捧读他们的作品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的。”在王彬彬看来，“一个创作者，一个艺术家的情怀，意味着对人类生存的一些最深层也最基本的问题的关心，意味着对人间邪恶的忧虑、愤慨和对人间正义的呼唤、渴求”^①，越是平民视角越能发现大的精神格局。

走向日常生活，也就是走向存在本身。从日常生活探索存在的深度，在小叙事小生活里造就大境界，是日常生活诗学建构的关键。日常生活叙事所关注的问题，大都是以往文学的盲点，因此其文学史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作家大都能意识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诗学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融合了日常生活的诗学。当今的现实生

^① 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活世界因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也隐含了日常生活诗学重建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世俗文化、大众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学者唐振常先生说，“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①。世俗社会的价值观是成功，考量的标准就是财富和地位，在疯狂追逐物质财富的现代性背景中，日常生活充满了工具理性的压抑，日常生活叙事在平庸平常中往往又陷入虚无。因此，对世俗的精神建构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诗学建构就很有必要了。本书从这种理论构想出发，运用现代思维，探讨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不同面相及其各自的诗学呈现，并以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杨绛、王小波、赵践、徐则臣等作家为个案，对现当代文学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进一步阐发日常生活的审美诗性内涵，从而充分揭示日常生活的诗学地位和价值。

^① [美] 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自序：被“压抑”的现代性 001

第一章 张爱玲：“俗”中真味 001

一、“电车回家”：都市与家园的对位转换 003

二、“屏风上的鸟”：欲望的“阉割” 024

三、“中国的日夜”：“出家”后的“还俗” 040

第二章 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057

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 057

二、“围城”：世俗与超越 062

三、漫画与审丑中的痴性挚情 074

四、世俗的生命体验与诗意的生命哲学 084

第三章 乡土日常生活的诗化 099

一、万物百汇中的“乡下人” 101

二、“边城”：乡土日常时空的诗意重建 116

第四章 “历史”裂隙中的“日常”叙事 137

一、历史的日常性 137

二、杨绛：“大”历史中的“小”叙事 141

三、历史记忆与青春书写 153

第五章 女性视角下的都市日常生活诗学 164

一、一个人与一座城市 165

二、都市的“家常”性 171

第六章 “底层”视域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177

一、徐则臣：贴近生存的“及物”写作 178

二、“生存之民工”的城市与乡村 184

丛书后记 193

第一章 张爱玲：“俗”中真味

作家大都有对真的艺术追求，通过创作实践去扣问社会、人生和自我的真实。真，其中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自然，合符天性，不矫揉造作。也就是说，不俗。钱钟书在《论俗气》里对“俗”的论定，是过分，不必要的成分太多：“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粗卤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卤而妆细腻，愚陋而妆聪明，呆板而妆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装模做样的人。”^① 张爱玲处处标榜自己是个俗人，酷爱俗物，坦承自己对金钱名利的欲望。“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② 在时下知识分子文人普遍清高的自我塑像下，她的这一自我标榜有主动追求的意味，而不是被动地被人指认，这本身就反映了她的不“俗”。正因为她不避俗，坦然面对俗，俗得真诚，才是她真正不俗之处。“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③ 张爱玲把自己自贬为一个卖文为生的匠人，她的这一姿态和立场，实则是对远离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文人故作姿态的清高孤傲形象的否定和改写。对张爱玲来说，对读者趣味和市场因素的迁就，除了文人“为稻粱谋”的实际生存需要，客观上也是对当时革命文学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抵制。当面临文坛对她不革命的批评和指责时，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为自己申辩道：“一般所说‘时

① 钱钟书：《论俗气》，载《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钱钟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

②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载《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③ 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书，第232页。

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① 张爱玲理直气壮地以男女情爱为题材，“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尤其在革命、运动、战乱频繁的时代，情爱题材在文学领域里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表现，而往往只是作为整个故事的点缀和穿插，在“五四”新文学传统里更是没有地位。张爱玲看到了情爱宽广的辐射面，看到情爱能深入许多重大问题，触及革命、战争等无法达到的人性和社会的深度和高度。张爱玲虽然写的是情和爱，然而却没有真正的情、真正的爱，真正的情和爱是做不了主的，做得了主的是人性，是黄金，是伦常，是习俗，是战争，是人生的种种封锁围困。总之，任何一方面都比情爱本身更有权威，如《倾城之恋》《金锁记》。但情爱依然有着巨大的摧毁力和创生力，那也是生命本身的力量。那世俗婚恋中为各自的利益彼此算计的男女，也时时要为爱所捕获，而暂时忘记了那算计，露出软弱却本真的一面。在张爱玲这里，人生软弱阴柔的一面，往往比刚硬更能代表人性的真实。张爱玲通过婚恋主题，把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种种复杂性和可能性在历史变迁中动态地展现了出来。

张爱玲通达世故人情，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她始终关注的是人，是人在现世中的安稳不可得，得到后的空虚。尤其是女性，女性为自己寻找一个安身之所的艰难，以及在环境逼迫下种种“算计”的妾妇之道，不能简单地以道义去言说批评，张爱玲是宽容的，因为她看到了算计背后的辛酸、无奈，无父无母的女性，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通过世俗的书写，揭示了生命的常与奇，生命性关怀到了相当的深度。张爱玲从无“意义”的纯粹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中去还原生活，以朴素的世俗情怀去对抗男性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道德等宏大话语，通常知识分子所不愿沾染、深究和俯就的俗，张爱玲仔细地翻检、咀嚼那俗中的真味。她洞悉人情的入世入俗，其实反而是远离尘俗、不通世故。因此，张爱玲的俗，其实是取了俗的外在特征，而精神实质上她是反俗的，是求本归真的。张爱玲声称自己是个通俗作家，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日常人生里那些不堪入文的

^①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拉杂琐碎，在张爱玲笔下都浓墨重彩，都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难道说，张爱玲刻意用心地在生活的俗事俗物上做文章，是想在都市色彩缤纷的热闹中，在如梦似幻的人生里，攀住一点儿可亲可感的“真实”，化解她那具有没落贵族血统一文人气质里对这个人世幻灭悲凉？

张爱玲身上具有贵族气质和平民精神的奇异调和，这固然和她那没落贵族的家庭出身以及后来生活的变故动荡有关，但更是作家本人探寻人生真相的过程中所生发的一种人生态度。她的思想和情感是“出家”后的还俗。在对人生有了彻底的理解和谅解，在把自己降到了一无所有的“平民”的身份和地位上，在降低和放弃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在一无所有一无所求后，张爱玲重新在“无”后面发现了“有”，重新发现了生活。在张爱玲看来，俗世中的平淡才是生命的本色，才是可感可触的真实。平淡既是张爱玲对人生的态度，也是她对文学的认识。张爱玲的平淡是经历了绚烂之后的平淡，她的平民精神也是经历了富贵之后的平民化，因此也就更彻底投入，体察人生时也就更体贴入微。张爱玲把自己对人生整体的悲观绝望物化在人物那具体琐碎的悲欢离合之中，虽也是写的浮世的情和爱，然而却不止于浮世的悲欢，而是触摸到了人生的底部。因此，张爱玲的突围叙述，既是女性性别突围，也是人类自身的突围，是在绝望中寻找安慰，在黯淡中制造心灵的华章。“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而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① 张爱玲在故事层面上，是女性主义的视角，而在故事背后、在意义深层，却隐含着一个人更宽广的人类学的视角。张爱玲具有现实性，同时具有“诗”的超越性，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过人之处。

一、“电车回家”：都市与家园的对位转换

1. 由弃父到恋父

张爱玲的一生也没有一个可栖息的安稳的家。

^① 刘再复：《也谈张爱玲》，载《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版，第291页。